

导 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构想

在 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国家统一、文化复兴的时代大潮中，在跨向新世纪的凯歌中，我们先后迎来了改革开放 20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 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

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50 年也好，80 年也好，都可谓短短的一瞬间。然而，这是多么不平凡的 80 年和 50 年啊！

这是历史巨变的 80 年和 50 年。

这是天翻地覆的 80 年和 50 年。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指导我们取得辉煌胜利的 80 年和 50 年。

回首这 80 年和 50 年，展望新世纪，我们面临的时代主题与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

改革开放 20 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年的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在毛泽东、邓小平、

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下，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时代特点、中国国情相结合，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探索历程中，在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中，三代领导集体先后形成了三个伟大构想。

第一个伟大构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主要体现为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新民主主义论》基础上 1956 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这是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最初起点。

第二个伟大构想，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主要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和南方谈话中，这是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根本突破。

第三个伟大构想，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主要体现为 1995 年提出的十二大关系、世纪之交提出的“十五”规划构想、“三个代表”的闪光思想，制定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纲领，这是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继续发展。

毛泽东思想中的第一大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的头 8 年，因有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理论奠基，因而迅速接近了现代化起飞的助跑阶段，但这一阶段的中后期，也开始受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影响。1956 年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演，提出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大构想，也是这一伟大探索的历史起点和思想起点。

20 世纪 40 年代，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与实践，标志着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经过近代百年的上下求索，终于找到了适合时代潮流与本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新中国建国之初的 8 年间，虽然从 1953 年起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但总的来说，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实际上仍有重大影响。这一时期最大的历史成就，首先在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最成功的历史经验，首先在于我们创造了扎根中国国情、富于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

制、政治体制和新型精神文明；最深层的规律，首先在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集中表现为发展生产力与走向共同富裕的统一；这一时期的成功经验，首先在于以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为主要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和具体体制。这一社会制度和体制，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和体制，又明显区别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僵化模式。这种新民主主义体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奠基工程，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主导下的新型市场经济，在体制建构与经济发展上，有新颖、独特的五大创造：

(1) 建构保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多层次经济结构，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而总体上又相当落后的基本国情；

(2) 新民主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体系，从微观机制角度看，市场是经济联系的主要中介、资源配置的基础环节，从宏观调控角度看，国民经济总体又有一定计划性；

(3) 照顾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以便调节内部矛盾，防止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4) 灵活多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以便对私人资本主义，建立“发展—利用—限制—改造”四个方面协调一致的经济机制；

(5) 自主自愿、循序渐进的农业合作制，以便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发展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这两种积极性。

这种新型的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颇为独特的五大经济政策，使新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建国之初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使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发展已相当接近现代化起飞的临界状态。

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民主。在体制建构和民主形式上，有独具特色的四大创造：

(1) 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联合的统一战线制；

(2)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政治协商制；

(3) 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制；

(4) 人民代表大会制。

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上，也有一系列新的建树，强调建设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新文化，萌发了一种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新型文明。

新中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盛况，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

道的美好回忆。这里最本质的成功之处、成功经验，绝不是我们在某些方面照搬了苏联的僵化模式，当然也不是我们受了苏联模式的影响，而是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为主导思想。

1953 年斯大林逝世之后，特别是 1956 年初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僵化模式的问题和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对中国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暴露出来。

正是以此为契机，在 1956 年 4 月、5 月间，在党的八大前后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际，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演，代表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寻找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伟大构想。

这十大关系，前五条主要牵涉经济体制，中间四条主要牵涉政治体制，最后一条牵涉到对外开放：

- (1)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 (2)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 (3)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 (4)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 (5)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 (6)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 (7) 党和非党的关系；
- (8)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 (9) 是非关系；
- (10) 中国和外国关系。

前有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与实践作为铺垫，后有 1957 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补充，以《论十大关系》为主提出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大构想，主要有四大理论创新：

- (1) 在 50 年代中期，率先提出国际形势可能会出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需要根本克服战时形成的苏联传统体制的历史弊端；
- (2) 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当代中国基本国情，有计划地进行第一次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抓住了影响全局的十大矛盾、十大关系；

(3) 从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提出了重点论与两点论和谐结合的对立统一观，为从理论思维高度突破苏联僵化模式、创立中国新型体制，奠定了最初的方法论上的哲学基础；

(4) 以苏联为鉴戒，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严重压抑地方、企业、个人积极性的苏联僵化模式的束缚，努力开创

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探索也留下了未能根本解决的四大难题：一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转移的关系问题；二是决定全局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三是十大关系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四是体制改革与发展模式的关系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远未根本解决，加上国际、国内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从 1957 年下半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开始抬头，1958 年以后又开始了三年“大跃进”，而从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更使“左”的指导思想占据上风，造成了巨大的历史性灾难。

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正确探索的实践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从正反两方面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大突破，作了重要铺垫。

邓小平理论中的第二大构想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践基础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到 1992 年南方谈话，邓小平理论初步构成了比较成熟的科学体系，其核心内容正是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大构想，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重大突破和关键一环。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本质内容。

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理论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具体可归纳为四大支点：一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科技革命新时代；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国情；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四是当代社会主义与东西方现代化的新经验。

邓小平理论是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思想大树，它的根深深地扎在社会实践的土壤之中，并且有两大根系：一条根系扎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土壤之中；另一条根系扎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之中。

邓小平理论的创造过程，有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关节点：

邓小平理论创立的历史起点和思想起点，是邓小平为 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理论基础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它是中国开始解放思想的宣言书，也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它深刻地回答了十年动乱、两年徘徊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邓小平理论创造的思想制高点和理论归宿点，是 1992 年春天的南方谈话。它是 90 年代中国深入解放思想的宣言书，也是 90 年代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它深刻地回答了 1989 年政治风波和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1992 年南方谈话，是以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历史经验为实践基础的，是邓小平本人理论的大成之作、成熟形态、发达机体和思想高峰，可以视为第二大构想的完成之作和代表之作，其“骨骼”系统是六个要点、十五大关系：

(1) 现代化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何者为主要矛盾与工作重心的关系问题：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必须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问题：为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真正保证“一个中心”，必须把握“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不可割裂；

(3) 根本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只有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而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

(4) 姓“社”姓“资”的关系问题：必须反对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的姓“社”姓“资”惟一价值标准论，必须注意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特别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二者对立统一的复杂辩证关系，必须确立“三个有利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价值观；

(5) 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中的义利关系问题：针对姓“社”姓“资”惟一价值标准论的“左”倾空谈症，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新型价值标准，强调功利当先、义在其中、义利统一、不可割裂；

(6) 社会主义本质中解放、发展生产力与走向共同富裕的关系问题：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建设途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这种根本途径与根本目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基本精神与本质要求；

(7) 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计划与市场是走向生产

社会化的两种手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无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8) 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社会主义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关系问题：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出发点，通过全面开放、汲取发达资本主义乃至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这条历史必由之路，最终达到增强社会主义主体性、优越性的目的；

(9) 贫穷与富裕、先富与共富、国富与民富的关系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国富民之路，要分“三步走”，有计划、有步骤、不失时机地解决先富与共富、富民与富国的关系问题；

(10) 警惕右与防止“左”的关系问题：在改革开放全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左”与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从中国国情特点、党内特点来说，要警惕右，更要重点防止“左”；

(11) 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保持稳定的关系问题：以保持稳定为前提，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加快发展为目标，最终达到现代化发展的长治久安；

(12) 发展经济与科技教育的关系问题：现代化经济建设是发展科技教育的物质基础，而在现代科技革命时代，科技教育则是现代化经济起飞的龙头；

(13) 改革开放与惩治犯罪、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关系问题：要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搞上去，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4) 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同党的建设、思想建设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使党重新焕发生机，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适应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需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学风建设；

(15) 中国发展前景和世界和平发展、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也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这两大问题远未真正解决，21 世纪的中国必将迎来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的双重现代复兴。

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大构想，给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体制转换的根本突破与根本创新，主要表现为五大转变：

(1) 体制目标上的根本转变：从多年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定不移地转向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

(2) 经济结构上的根本转变：从“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僵化经济结构，转

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层次经济结构；

(3) 运行机制上的根本转变：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

(4) 对外关系上的根本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向独立自主的全面开放、全球开放态势；

(5) 发展模式上的根本转变：从脱离国情、急于求成、主观片面追求高速度、“大跃进”的非持续性发展模式，开始转向符合实际、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三步走”和“百年建国方略”。

邓小平理论中的第二大构想的历史地位，可以总结为两句话：它实现了对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僵化观念的根本突破，并且是不可逆转的根本突破；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基本成型，并且是全方位的基本成型。

邓小平理论中的第二大构想，也留下了两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时代课题：一是怎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从基本成型走向完全成型，特别是怎样解决新型体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问题，防治官僚腐败？二是中国怎样迎接 21 世纪全球化趋势与知识经济时代的严峻挑战？

江泽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第三大构想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从 1995 年底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十二大关系论纲，到 1997 年 10 月的十五大政治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再到世纪之交提出的科技创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世纪发展的第三大构想。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百年历程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以拼搏精神，经受六个关口的严峻考验：

第一关，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的考验；

第二关，第二代与第三代领导集体交替的考验；

第三关，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考验；

第四关，经济起飞高峰期加快发展，同时防止官僚腐败症的考验；

第五关，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的考验；

第六关，全球化趋势与知识经济带来的 21 世纪全球格局与国力竞争的考验。

这种种历史考验汇总到一起，就给现代化起飞过程中的中华民族提出了一个最大课题：跨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 21 世纪，带入新世纪的世界格局，带入未来世界的新型文明中去？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改革开放两个十年的历史经验为实践基础，逐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世纪发展的第三大构想。

第三大构想的思想起点，是在以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主题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发表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该讲话列举了关系到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可以简称为《十二大关系论纲》）：

- （1）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 （2）速度和效益的关系；
- （3）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 （4）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
- （5）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
- （6）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
- （7）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
- （8）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
- （9）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
- （10）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 （11）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 （12）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1997 年，党的十五大筹备中面临的一个特殊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幸逝世，离开了我们。“邓小平身后的中国向何处去”，“跨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国内、国际瞩目的焦点问题。如何使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下去，不动摇、不中断、不低落、不逆转，成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肩负的历史重任。

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就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党召开了有关键意义

的十五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中国现代化跨世纪发展的第三大构想，主旨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2000 年，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五”规划建议，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党中央、国务院又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完善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第三大构想。

200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发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系统阐明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十六大作了重要的理论奠基，也使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第三大构想趋于成熟。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中国跨世纪发展的第三大构想，主要在哪些方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可以说集中体现在以下八个重要方面和重大关系之中：

（1）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首次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概念，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指导思想与伟大旗帜，强调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有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又有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的开拓创新性；

（2）稳定、改革、发展的关系：把稳定、改革、发展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跨世纪发展中统揽全局的基本问题，把稳定、改革、发展的协调一致作为把握大局的基本方针；

（3）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努力把计划与市场作为生产社会化的两种手段结合起来，把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把市场机制与国家适度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从而彻底完成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力争在 2010 年前后初步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

（4）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必须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从非持续发展道路，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

（5）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在坚持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上来，在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纲领；

（6）经济起飞与科教兴国、知识创新的关系：在科学技术革命大潮与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代，现代化经济起飞必须走科教兴国的大道，把创新精神作为决

定民族命运的关键所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新型轨道；

(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精神文明的关系：为了使中国现代化起飞能够保持跨世纪持续发展势头，要采取“一体两翼”式的总体发展战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市场经济”为主体，逐步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法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精神文明”的两翼，使现代化起飞飞得更快、更高、更远；

(8) 经济建设与党的建设的关系：经济建设是重心，党的建设是关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可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支柱不可丢，在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前提下，党的队伍仍要“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最根本的是按照“三个代表”的重要标准，实现党风党建的重大创新，建设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复兴，并且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十二大关系——全面创新论——“三个代表”，这是第三大构想形成过程的“三部曲”，也是江泽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三个最为重大的理论创新，其中“三个代表”思想是最突出的闪光点和生长点，甚至是统摄全局的一根思想红线。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代表新中国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构想，指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 年的辉煌历程。

这三大构想，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一条思想红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正是这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开拓创新的三大构想，指引着亿万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使“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国家统一—文化复兴”，成为中国 21 世纪发展的时代主流，使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大势已成，不可逆转！



第一篇

毛泽东思想中的 第一大构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工业化大道

什么叫“毛泽东思想中的第一大构想”？

这里所说的“第一大构想”，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 1956 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以苏联为鉴戒，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而提出的最初战略构想。

第一大构想的历史源头和理论源头，可以向前追溯很远，直至毛泽东首创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

第一大构想的重要理论起点，是 1956 年 4 月至 5 月间毛泽东发表的两次讲演——《论十大关系》。

第一大构想的主体部分，还应包括 1956 年 9 月八大前后，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提出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闪光思想。

第一大构想形成过程基本结束的标志，是 1957 年初毛泽东发表的重要讲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论的多重铺垫

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带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构想。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其深厚基础首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与实践的多重铺垫。

毛泽东首创的新民主主义论，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论，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论。

中国国情的特殊逻辑，中国历史的特殊逻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特殊逻辑，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能长期简单照搬苏联模式，必然要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

具体分析起来，这种铺垫作用主要有三：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历史铺垫；二是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的理论铺垫；三是建国伊始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实践铺垫。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历史铺垫

20 世纪中期，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主要理论旗帜，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现代化道路。建国以后，尤其是 1956 年前后，毛泽东又为突破苏联僵化模式，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这一代人，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上，先后迈出了历史性的三大步，作出了奠基性的历史贡献，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

第一步是在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基础上，使中国第一次有了现代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五四运动是开辟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文化先声；“德先生——现代民主政治”和“赛先生——现代科学文化”成了领导中国思想大潮的两大旗帜，可惜缺少了一个“妈女士——现代市场经济”与之配套，因而未能形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完整纲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又树起了中国特有的政治革命、武装革命的两面旗帜——农民土地革命和以农村包围城市，但仍缺少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新民主主义纲领。

第二步是在深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制定了比较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从理论上指出一条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火中，闹中取静，潜心进行哲学研究，在理论建设上有独到建树和成功经验，为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论，奠定了四大哲学基础：一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点的实践论，由《实践论》奠定基础；二是以共性、个性统一为精髓的矛盾论，由《矛盾论》奠定基础；三是以两大基本矛盾为主线 of 中国国情论，由《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奠定基础；四是以对经济、政治、文化、人的综合考察为特征的综合国力论，由《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于 1940 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加上 1945 年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

文化一体的完整的建国大纲。

第三步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了色彩斑斓的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流砥柱，经过 8 年的浴血奋战，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鸦片战争以来 100 年间，中国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此后，又经过 3 年的人民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的建立和随之展开的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国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提供了初具轮廓的建国大纲，其中包括四大要点。

(1) 重心转移论。建国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要实行相互联系的两大战略转移——从农村转向城市，从阶级斗争转向生产建设。

(2) 中国国情论。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现代化的工业仅占 10% 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则占 90% 左右，这是建国之初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相当长时期内决定其他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政策上的问题。

(3) 经济纲领论。由上述基本国情决定，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的首要的目标；在经济结构上，要允许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上个体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彼此互补、共同发展；对私人资本主义，要实行“适度发展”和“节制资本”的双重统一政策；对农民，要实行“保护个体经济”和“引导合作经济”相结合的政策。

(4) 政治纲领论。在政治上，要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主要的历史经验，也是主要的政治纲领；在国内，要“唤起民众”，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国际上，要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和人民；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要防止居功自傲、糖衣炮弹、官僚腐败、蜕化变质。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的理论铺垫

从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内容，是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其中包括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三个方面。其精髓就是现